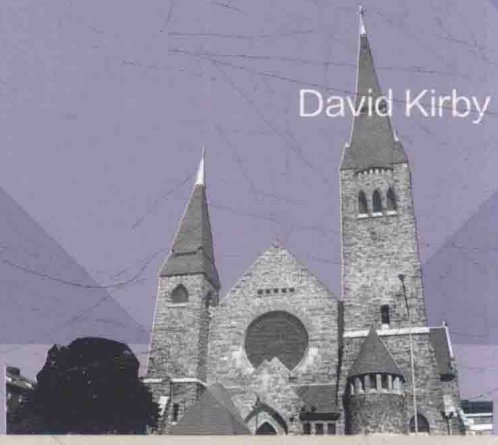
东方·剑桥 世界历史文库
Orient &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Library

芬兰史

大卫·科尔比 著　纪胜利 等 译

A Concise History of Finland

David Kirby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东方·剑桥 世界历史文库
Orient &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Library

A Concise History of Finland

芬兰史

大卫·科尔比 著　纪胜利 等 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芬兰史/(英)大卫·科尔比著;纪胜利等译.—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5
(东方·剑桥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7-5473-1114-1

Ⅰ.①芬… Ⅱ.①大…②纪… Ⅲ.①芬兰—历史
Ⅳ.① K53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1340 号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7-252 号

This is 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 Concise History of Finland by David Kirby, first published 2006 .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2016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only. Unauthorised export of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责任编辑:赵 明
责任印制:徐儒静
装帧设计:罗 洪

芬兰史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021)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0×960 毫米 1/16
字 数:275 千字
印 张:20.25
版 次:2017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1114-1
定 价:5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021)52069798

序　言

芬兰完全可以称得上现代史上取得巨大成功的传奇之一。在不到 xii
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芬兰从欧洲北部边缘一个贫穷的农业地区变为今日欧洲联盟内最繁荣的国家之一。这一经历令人瞩目，但绝非一帆风顺。1918 年，芬兰自俄国统治下取得独立，伴随而来的是痛苦的内战，在芬兰政治肌体上烙下的伤疤持续数十年。从 1939 到 1945 年，芬兰经历了三次战争，两次反抗苏联，一次抗击德国。期间除蒙受巨大伤亡外，还失去了几乎十分之一领土。作为独立的共和国，芬兰政治史在 20 世纪大多数时间里深受冲突之困扰，与今日芬兰呈现之和谐一致的欧洲良好一员形象相去甚远。作为一个不再处于苏联阴影之下、自信而又坚定的欧盟成员国，芬兰在过去 20 年里的再造，还伴随着对民族历史和民族身份的重新认识。特别是，芬兰不久前还处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下，它作为清洗运动的一部分，与所谓“真空带”的东欧国家不久前的检查制度不无相似之处。

这种对一个民族过去的重新评价构成了本书的一个起点。虽然已考虑到社会、文化和经济均为构成因素，但不论就短期还是长期叙事而言，本书主要是一部政治史。

在采取传统编年史结构的同时，我尝试强调那些使芬兰得以成为 xiv
今日之芬兰的特征。特别是，我着重强调空间、时间和政治这三个对语

言和文化的形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维度。生活在寒冷而又相当贫瘠的北方土地上的人们寻求适应和改变之途，即怎样使这块土地成为他们谋生之地和家邦的象征，铭记于芬兰人心中。从冰盖开始退去人类开始定居的遥远时代到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付出巨大努力安置数千难民，在这块土地上努力谋生的斗争乃是一部史诗和不变的主题。在此意义上，芬兰曾是一个非常边缘化的国家，这可很好地用来解释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两种敌对和冲突的力量都在芬兰人的生活中留下印记。第一种看起来出自竭力索求和使用一切可能的资源的强烈驱动。这产生了很强的服从权威的传统，这个传统又被路德宗、强有力的贵族机构和对法律的严格信奉所强化。不过，该传统同样更倾向于合作一致而不是强制。第二种是一种很少正式定义的出自野蛮、目无法纪的传统，一种漠视或不服从法律的边民心态。亚历克西斯·基维(Aleksis Kivi)写于 19 世纪的小说中所描写的七兄弟逃避文明世界，过着自由的野外生活；带着大刀傲慢地游荡的波的尼亚的流浪儿们；两次大战之间违反禁令向那些四处游荡的瘾君子们提供致命酒精的非法贩运者；阿基·考里斯迈基(Aki Kaurismäki)的电影中甚至也充斥的散漫和可悲的特征：所有这些均属于带有对上流人士强烈不信任的野蛮、轻慢和松散的传统。这种传统容易被成功故事的光华外表所掩盖，但它同样成为构成今日芬兰之一部分。

现代芬兰历史似乎摇摆于长期相对稳定以及不易察觉的变化和导致一切改观的短期爆发之间。目前看来这其中一段又要来过。我尝试
xv 对照自己所直接经历过的最近背景以理解和弄清楚这些变化，这一经历构成了我自己关于芬兰的见解和观念，坦率地说我的许多结论都可能打上这一经历的烙印。过去多年里，我从与芬兰和英国同事们的讨论中获益匪浅，非此，则我不可能写成此书，我要对他们的善意和支持表示感谢。我还必须感谢为我挑选图片提供方便的芬兰国家古迹局和赫尔辛基劳工档案馆。同样还要感谢总统档案馆允许我复制吉科宁总统 1961 年访美受到肯尼迪总统欢迎的照片。

芬兰的官方语言有两种，大多数历史专有名词源自瑞典语。在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认为恰当的地方，我使用瑞典词汇并同时标出芬兰语。除由于历史原因，瑞典语地名在某地更加著名外，譬如，1721 年的《奈斯泰德条约》(The Treaty of Nystad of 1721)，省、县和城镇的名字仅用芬兰语冠名。在某些情况下，我同样追本溯源，以芬兰词汇命名重要的机构，如议会。

目录 Contents

序言 / 1

第一章　中世纪的疆界 / 1
第二章　瑞典的遗产 / 25
第三章　从斯德哥尔摩到圣彼得堡(1780—1860)/ 56
第四章　萌芽中的国家(1860—1907)/ 86
第五章　独立的国家(1907—1937)/ 122
第六章　战争与和平(1939—1956)/ 166
第七章　吉科宁时代(1956—1981)/ 206
第八章　从民族国家到欧盟国家 / 235

大事记 / 260
芬兰总统 / 270
选举与政府 / 271
导读 / 275
索引 / 285
译者说明 / 311

第一章　中世纪的疆界

北欧构成今日芬兰共和国包括水陆在内共 338 145 平方公里的自 1
然轮廓，成型于大冰期之后。退去的大冰川冲蚀了芬兰-斯堪的纳维亚大陆架的结晶红岩石，在它身后留下了数千个浅湖、蛇丘、鼓丘，以及犬牙交错的海岸线，由于陆地还在从巨大冰川的压力下恢复，这样的海岸线仍然不断地从海洋中浮现出来。只是在芬兰极北端，陆地才高出海平面 1 000 米以上。在东面，曼塞尔凯丘陵是分别向西注入波的尼亚湾和向东注入白海的河流的分水岭。芬兰中央和东部庞大的湖泊系统被进一步向东南方的南海岸延伸的众多分水岭同海岸线分割开来。内陆地区几乎四分之一的表面被水所覆盖，进而有百分之二十为湿地，多半是沼泽和泥淖。除了极小的一块突出的陆地位于北纬 60 度线以南（奥斯陆和设得兰群岛在这一纬度上，斯德哥尔摩稍微更南一点），芬兰可称得上是欧洲大陆所有国家中最北面的，它从波罗的海北岸绵亘一千多公里直到北冰洋。夏天温暖，但很短暂；冬季漫长、黑暗和寒冷，不过地区之间有很大差别，西南部地区积雪的覆盖平均 70 天到 110 天，东部地区是 160—190 天，北部地区则是 200—220 天。北方土地上的 2
居民们不得不学会在寒冬、洪水泛滥的春季生存，也包括反复无常的夏季，因为 5 月或 8 月的霜冻可能会破坏农作物。这有助于形成这样的文化：顽强的适应力、忍耐以及辛勤地劳作受人尊敬。

芬兰是一块被森林覆盖的土地，绝大部分森林是松树和云杉，巨大的森林一眼望不到边；即使今天，该国超过一半的国土仍为森林所覆盖。9 000 多年前，很有可能是充满诱惑的森林吸引了来自南部和东部的定居者。中石器时代的史前文物和遗骨揭示了一种基本位于沿岸和主要水系广阔地带的渔猎文化。埃尔克是肉类、骨类、兽筋和兽皮的主要供应地，同样也以树木和石头吸引着新石器时代的艺术家们。海豹提供了供消费和贸易的脂肪、肉和皮；鱼，特别是狗鱼、鸟、坚果和浆果为这些早期的定居者提供了食物。

从大约公元前 3300 年起，相当于现在芬兰最西面的地区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该地制造具有篦纹特征的陶器。据认为，这种来自伏尔加地区的新文化的携带者同样操芬兰语，他们受所接触到的语言影响，逐渐形成了被历史语言学家命名的原始芬兰语。这些人看起来大多数定居在芬兰湾南部，不过其中一个操萨米语的群体在较早时候从中分离出来，移民到拉多加湖和奥涅加湖北部地区。同古波罗的海人和东日耳曼人的接触决定性地改变了原始芬兰语和操这种语言的人们。从芬兰湾南岸开始形成的四种主要芬兰语方言集团，即西南芬兰、海梅、萨瓦和卡累利阿，在随后几个世纪通过陆路和海路向北迁移。

到大约公元前 1500 年左右，北欧青铜时代开始时，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带出现了。在同斯堪的纳维亚和中欧的交往中，西部和南部海岸的居民受到强烈影响，这些偏远地区继续从东部受到文化上的刺激。在河谷和沿岸平原更加富饶的土地上，农业开始成为文化常态；在北部和东部的森林和沼泽地区，渔猎文化继续兴盛。芬兰人的起源，特别是定居地和文化的“东方”和“西方”外观，仍然是很多争辩和偶尔冲突的主题，这种争辩已经影响到并继续塑造着芬兰人对自己和他人的见解。芬兰人自己如何被外人理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事实上，这些早期作家（塔西佗在公元 1 世纪，乔达内斯在 6 世纪）提到的“芬尼人”试图辨认的北极地区居民，是北极地区的游牧猎人，他们可能确实同诸如 9 世纪的挪威渥太尔人这样的迁徙者进行贸易，后者对自己在北极旅行的叙述被韦塞克斯的阿尔弗雷德王保存给后代。

这些在极北部定居的人被12世纪挪威历史描述为“令人遗憾地崇拜虚构的上帝的人，即卡累利阿人和奎尼人(Kweni)，霍恩芬兰人(Hornfinns)和比阿米人(Biarmi)”。奎尼人和比阿米人也通过皮毛商人等其他途径为人所知，他们似乎是在白海与波的尼亚湾最北端之间的地区活动：作为与众不同的群落，他们曾经长期消失在时间的薄雾中。对于挪威人来说霍恩芬兰人可能是萨米芬兰人(SamiFinns，挪威最北端的地区称为芬马克[Finnmark])。卡累利阿人在12至13世纪开始从他们在拉多加和奥涅加的中心地区分散开来，向东到了北德维纳河的入口，向北到了北冰洋沿岸，在那里他们同挪威人发生冲突，而在西方则与海梅部落发生冲突。同时，他们同样开始受到东正教和诺夫戈罗德公国的影响和控制。

中世纪欧洲的“芬兰人”之所以拥有原始猎人、行巫术者和向搁浅的水手们兜售急需品的小贩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北大西洋冒险者们的讲述。我们明显缺少关于居住在波罗的海沿岸和逐渐定居在偏远地区的人们有文字记载的证据，不过13世纪一则关于从丹麦到东波罗的海航路的描写显示，这是维京时代一条很好的海路，考古发掘同样显示西部芬兰人了解并应用了维京人的造船技术。

“芬兰”一词在中世纪已经通用，不过采用它的地区仍然不清楚和被错误界定。具有突出意义的是，这个词被用来作为加强中央权威的手段：1229年，教皇格里高里九世用这个词宣称芬兰已经处于他的保护下，瑞典国王芒努斯·拉杜洛斯(Magnus Ladulås)在1284年任命其弟本格特(Bengt)为芬兰公爵。在天主教和瑞典的权威加强之前，有些史料，如石刻铭文和正教修道院的编年史，使用芬兰一词通常更多指的是某些部落，如海梅。这些部落具备进行战争和贸易的组织能力，并且当重大事件需要的时候，他们有足够的力量给自己的邻居制造麻烦；但这些从易北河一直延伸到北极圈的人与罗伯特·巴特利特曾经称呼的“没文化的多神崇拜者”圈中的人们有共同之处，最终都被纳入拉丁基督教徒的社团组织结构中。芬兰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11至13世纪能够生存下来，归因于他们在相当于现今瑞典中部平原的地区逐渐建立

了自己的领地。斯维王国和哥塔王国的扩张和兼并，向北和向西将诺尔兰、达拉那、哥得兰岛以及严格意义上的芬兰（瓦西奈斯-索米，艾根特里加）囊括进来。对于北欧乘船旅行的人们来说，在航行的季节里，波罗的海较浅的水不是障碍，而是提供了便利（不过冬季海上浮冰的确阻隔了通过海路和水路的联络），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所谓“十字军东征”之前环东北波罗的海边缘地带定居的人们已经混合与融合，而通常“十字军东征”是芬兰成为瑞典王国一部分的时期开始的标志。

18世纪早期历史学家阿尔戈特·斯卡林（Algot Scarin）确信，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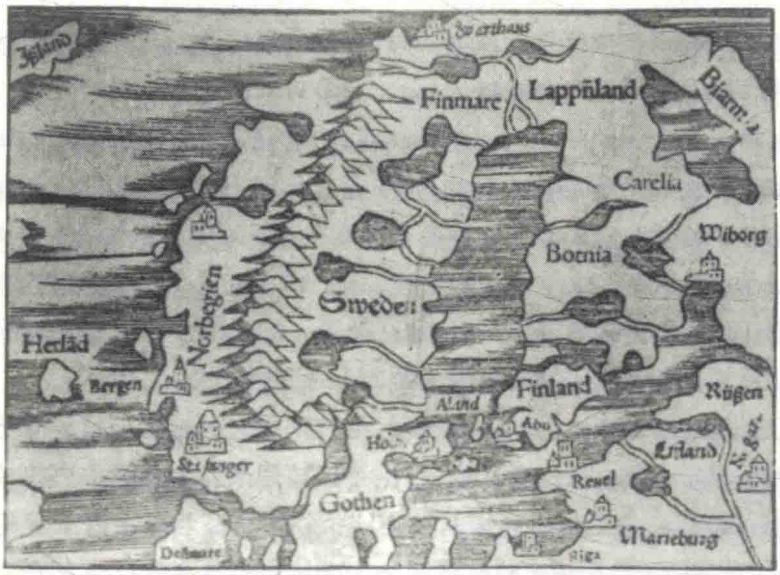


图1　北欧地图，取自于塞巴斯蒂安·明斯特著作《1552年的世界地图》。

第一幅详细的北欧地图是1539年在威尼斯印制的由奥劳斯·芒努斯（Olaus Magnus）编著的《卡塔·哥西卡》（*Carta Gothica*），后来重新命名为《卡塔·玛丽娜》（*Carta Marina*）。荒漠占据了地图的大部分，和奥劳斯·芒努斯16年后出版的作品中对北欧人的描述一样。人类居住和耕作的遗存仅限于西南角的芬兰本土。北部和东部是野兽出没的森林，鱼和禽鸟的世界，偶尔有人驾驶小船穿过湖水，或乘坐由马或驯鹿拉的雪橇越过冰封的海面。《卡塔·玛丽娜》这一简本后来在1544年塞巴斯蒂安·明斯特首次于巴塞尔出版的《世界地图》中再版，此后又再版数次。明斯特以芬兰语作为说明文字，恰好表明对于这一遥远的地方普遍的忽视和混淆。用其英文译者乔治·诺斯的话来说：“芬兰地方居民操两种混杂的语言。从维堡到波尔沃，大部分有斯拉夫口音，但在近海岸地区他们操瑞典语，在该国中部地区他们讲本地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基督教的纪念物或防御地点的缺少表明，芬兰的宗教仪式必定与其他北欧国家有所区别，而当芬兰人仍处于不开化状态时，瑞典人早已拥有了适合自己的最高权威。处在一个更加强烈的民族主义时代的历史学家们倾向于看到瑞典对芬兰统治的建立——正如 M. G. 许贝里森(M. G. Schybergson)在其 1903 年所著《芬兰史》所描述的——以及西方基督教价值的灌输。最近学者注意到这样的事实，这个瑞典邦自身处在创建的初期阶段，而且大多数发生在芬兰这一边的事情同样发生在西方那一边。尽管一般而言十字军的强烈动机是把十字架及其福音传递给那些不信教者和异教徒，但并没有造成公共政治机构建立过程减缓的重大影响。100 年后的 13 世纪 70 年代初次对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日期和性质的描述，有许多不确定之处。由英国人亨利控制的皈依工作据估计发生在短命的埃里克王朝(1155 或 1156 至 1160 年)期间。由于这两人不久都被谋杀并被抬高为广为传颂的圣徒，我们有理由对于民间传说的虚饰保持一分审慎。拉里(Lalli)关于亨利被谋杀的故事和随后发生的一些神奇事件，相对出现较晚。同时，埃里克的神圣品德被其子加以夸大，以炫示其家族的荣耀和声名。短暂的入侵可能对于瑞典王国同诺夫戈罗德公国之间冲突的增加不无影响，后者一直寻求在奥涅加和拉多加湖西部增加领土。侵掠和反侵掠并不是有计划的持续运动，而是常态，埃里克绝无实力和意愿帮助十字军使芬兰人皈依。

尽管有了某些布道活动，然而 1171 年格雷维斯(Gravis)教皇致乌普萨拉大主教和 1172 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给其下属主教们的敕令要旨表明，这些活动进展有限。敕令想必是打算敦促瑞典采取行动，或者它是想通过在丹麦王国的被驱逐的隆德大主教重新确定对新产生的瑞典主教区的权威。向东波罗的海扩展的贸易，促使德国商人前往哥得兰岛和诺夫戈罗德，巩固了丹麦在北欧的权利，并且推动了沿波罗的海南岸向东推行强制皈依进程的稳步进展，可能同样唤起了教皇对北欧新的兴趣。从 1191 到 1202 年，丹麦军队数次入侵芬兰和爱沙尼亚。由里加主教布克斯特胡德(Buxtehude)的阿尔贝特在 1200 年建立的“圣剑兄弟骑士团”忙于进一步向南扩展，迫使环绕道加瓦河口的利夫

图 2　亨利主教把谋杀他的拉里踩在脚下。

取自 1448 年出版的 *Missale Aboense*。根据从 13 世纪以来最早的传奇作品，亨利是英国人，被选为乌普萨拉的主教，他在 1150 年代同瑞典埃里克国王一起对芬兰进行十字军讨伐。他在一个冰冻的湖上被一个叫做拉里的农民谋杀了，后者受到其怀有怨恨的妻子的挑唆。13 世纪的一部诗作的残篇写道，亨利在死前颁布命令，他的遗体要由两头牛拉的车载运，牛歇息的地方就是他的安葬地。这一幕最后发生在努西埃宁，芬兰第一个主教席位，虽然这一席位最终在 13 世纪转到了图尔库，但努西埃宁在整个中世纪仍然是朝圣的中心。拉里由于自己的亵渎行为而遭到惩罚，当他打算脱下偷来的主教帽子时，却失去了自己的头皮。人们很想看到在这历史上头一遭有记载的芬兰人——“野蛮人”和“文明的”西方人之间宿命般的遭遇中，对于后来芬兰认同的发展一个范例。

人皈依。教皇的信件表明瑞典人同样进行了十字军东侵，不过直到丹麦军队最终把注意力转向芬兰湾南岸，并且在 1219 年征服了爱沙尼亚的林登尼斯要塞——被他们倾覆的城堡基础仍然是现代塔林市的轮廓线——在这之前他们看起来不打算在芬兰建立长期的政治存在。

到 13 世纪中期，在严格意义上的芬兰相对富饶的平原上和分散的奥兰群岛上存在着一个可以辨识的基督教社会。主教教区最终在奥拉河岸建立起来，并且在后来 600 多年里成为芬兰国都的地方教区大教堂开始兴建，该地瑞典语称做“阿波”，或者“河边定居地”；芬兰语称做

图尔库，或“交易地”。在托马斯主教强有力的领导下，对异教的海梅人的布道开始了。这个皈依工作不唯天主教垄断，俄罗斯东正教也在海梅人中间积极活动，以向拉多加和奥涅加环湖地区扩展势力。事实上，由教皇格里高利四世在 1237 年发起的对海梅人的十字军行动，成为由教会和瑞典国王召集的军队同诺夫戈罗德王子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军队之间的剧烈冲突。俄罗斯编年史记载：1240 年，瑞典军队在涅瓦河与伊兹哈拉河交汇处遭到沉重打击。但是，根据写于 14 世纪 30 年代的史诗《埃瑞克斯卡隆尼堪》(*Erikskrönikan*)，瑞典人在 9 年后由强悍的贵族比格尔·亚尔(Birger Jarl)率领进行了报复，海梅人最终被征服。史诗说：“他们向基督徒献土乞和/我相信他们在那苟延残喘/那块土地转向我们的信仰/这使俄王痛苦不堪。”瑞典和挪威在 1249 到 1250 年陷于严重的冲突中，从日期上来说，使得这第二次的十字军行动事实上不大可能，而且有人认为它确实在早此十年前发生，在巨大的灾难，即诺夫戈罗德处于蒙古人的高压之下，袭向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之前。

不管事实真相怎样，图尔库和海梅坚固的堡垒建筑是瑞典皇家权威存在于波的尼亚湾东岸的可见证据。在东部边界的维堡，城堡基础的三分之一到 13 世纪末被倾覆，瑞典同诺夫戈罗德旷日持久的战争在 1323 年以签订和平条约正式结束。《奥列沙克和约》(Oreshek, Pähkinäsaari, Näteborg)的确切条款在历史学家当中引起了很多争论。看起来双方确定了对卡累利阿-伊萨摩边界线进行公平细致地描绘，使该处一分为二，但是此后对于该分界线的解释却是开放的。可能出于收税的目的，双方对居住在延伸于从大湖区到北极广大森林和沼泽地区的居民进行界定的兴趣要大于保障边界安全的兴趣。随后，由于内部动荡，蒙古人、立陶宛人和条顿骑士团的威胁，诺夫戈罗德大大削弱，而无力保障这些权力了。但是 16 世纪第一批在北极沿岸定居的俄国人追溯既往，恢复了对这一地区主权的宣示和征税权。

在芒努斯·拉杜洛斯王朝(1275—1290)和芒努斯·艾里克松(Magnus Eriksson)王朝期间，瑞典贵族议会的建立、行政管理机构和财政组织的出现，以及法典的确立，成为王国巩固的最明显标志，而王

国同样沉醉于对北欧地区的领土野心和王朝冒险。芬兰地区实质上被并入瑞典王国,由国王的代表芬兰大公监领。瑞典王国认识到领土的扩张已经超过了严格意义上的芬兰,乃于 1340 年任命丹·尼克里松(Dan Niklisson)为"东部领土的统治者",他的继任者耶哈德·许特(Gerhard Skytte)因袭此名,该称号一直使用到 16 世纪。该统治者也是图尔库城堡的要塞司令,并且拥有对另外两个采邑的城堡的管辖权,不过作为边地居民的领主,坐落于东部边界上的维堡要塞司令通常保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到 14 世纪末,为南海岸"新土地"新置了辖区,此地因其岩礁和海湾在先前的 200 年里吸引了来自瑞典的定居者,也为西南部的萨达昆达地区设置了新行政辖区。这项政区重组工作主要是由铁腕的布·荣松·格里普(Bo Jonsson Grip)来做的,作为对帮助梅克伦堡的阿尔布雷克特(Albrecht)取得瑞典王座的奖赏,他获得了芬兰封地。布·荣松还把边界向北推进到奥斯特洛波的尼亚,摧毁了科尔霍姆城堡,并成功地抵制了诺夫戈罗德驱逐其军队的企图。

芬兰地方的行政权交给了贵族成员,不过尽管在 15 世纪早期诸如布·荣松·格里普和卡尔·克努特松(Karl Knutsson)这些令人恐惧的人物有能力在地方上打下自己的权利根基,但这些地方的确没有脱离同王国其他地区的联系。用埃里克·克里斯琴森(Eric Christiansen)的话来说,就是"这支难以约束的势力的影响不是把该省从瑞典分离出去,而是刺激瑞典权力机构的发展能够作为使地方利益得到保护的方式"。法律得到贯彻,争端解决了,捕鱼和狩猎权力通过在百户邑举行的各种法律会议得到解决。这些法庭的法官们从地方农民中挑选出来,不过百户邑的负责人恒定由地方乡绅担任。从 1435 年开始,该地分为两个巡回审判区,诺尔芬内(Norrfinne)和瑟德芬内(Söderfinne),在圣亨利圣宴日的前一周,一年一度的高级法庭在图尔库开庭。国王芒努斯·艾里克松的土地法,加上 1442 年修订的以国王克里斯托费尔名字命名的法律汇编在实行中有一些不同版本,直到 1608 年在芬兰才有了确定的土地法印刷本。

芒努斯·艾里克松的长期统治在骚乱中结束。他的外甥梅克伦堡的阿尔布雷克特最终继承了其王座,但以向由布·荣松·格里普领导的

权贵们作出重大让步为代价。接下来轮到阿尔布雷克特被伟大的丹麦王瓦尔德马·阿特达(Valdemar Atterdag,1340—1375)的女儿、芒努斯·艾里克松的儿子挪威国王哈康(Håkon,1339—1380)的妻子马格丽塔 11
(Margareta)所算计。通过迫使丹麦贵族在 1375 年接受其幼子奥拉夫(Olav)为瓦尔德马·阿特达的继位者,马格丽塔成功地使奥拉夫在十年后成为挪威国王,到 1387 年 17 岁的奥拉夫驾崩时,她正一直试图迫使瑞典人支持奥拉夫成为瑞典国王。出于对梅克伦堡家族重新执政的担心,丹麦和挪威的贵族们选择马格丽塔作为两国的摄政。瑞典在一年后如法炮制,也授权马格丽塔提名未来的国王。驱逐最后一批海盗与冒险家花费了 10 年时间,这些人在阿尔布雷克特暴政期间企图在哥得兰岛建立自己的统治。但是在 1397 年,马格丽塔指定的接班人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Erik)作为三个王国的统治者在瑞典的卡耳马城加冕。卡耳马联盟拟定的文书无论就文件的形式还是内容而言,一直以来都是具有很大矛盾的主题。就形式而言,文件写在纸上,由来自三个王国的七名高级议员签署,但随后他们都没有如曾经承诺的那样在上面盖章。该文件承认埃里克在其有生之年为选王,并且在国王出现合法继承人问题时,三个王国的代表将选举国王的某个儿子为继承人。联盟文书明令指出每一国家将由它自己的法律和当地贵族阶层人士管辖,但是它力图堵上违法者在联合体的其他国家避难的漏洞。文书还是一个共同防御和援助协定,并且国王有在来自三国的议员参与的情况下主持外交谈判的权力。

很大程度上由于受到先前共同经历几十年暴政和动乱的不幸经验的促动,卡耳马联盟是一个在规模上过于野心勃勃的方案,很快就遇到了麻烦。直到 1412 年去世,马格丽塔一直有效地统治着三个王国,并有足够的权威推行自己的意志。譬如在芬兰,她可以把采邑直接置于国王控制之下,而不是出租给贵族们。她还试图逐渐恢复对已经转入贵族之手的土地征税,后者处于上层社会享受免税的待遇,作为回报,他们向君主提供军事效劳。埃里克八世(1397—1439)恪守马格丽塔相 12
当自治的政策,但不久,由于任命外族人掌管最重要的采邑而疏远了瑞典贵族。埃里克耗资很大的战争增加了税收负担,这导致动荡和农民起

义在1434年迅猛爆发，瑞典和挪威交界处的达拉纳山区农民在地方小贵族恩格尔布雷克特·恩格尔布雷克松(Englebrekt Englebrektsson)的带领下举行起义。尽管恩格尔布雷克特本人在1436年被谋杀了，埃里克却再也没有恢复对瑞典的控制，而且同样失去了丹麦贵族的信任。联盟再也没有一个国王能够有效地建立对所有三国的控制。事实证明，恢复对瑞典的控制尤为困难。一个组织严密的权贵小集团施展阴谋诡计使联盟管辖失效，并且使瑞典陷入贵族独裁体制；通过政治阶层和地方会议，以及从15世纪中叶开始的国民会议的演化，王国议会的一致原则不仅延续下来而且有了重大扩展。①

联盟国王同瑞典权贵之间这些迁延日久、令人厌倦的争夺对芬兰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东方人”在恩格尔布雷克特大起义中作用甚微，而年迈的图尔库主教芒努斯·奥洛夫松·塔瓦斯特(Magnus Olovsson Tavast)则例外，他是1434年11月被挑选出来调解国王同其瑞典臣民之间关系的高层人物之一。1362年，执法官会同陪审团牧师及12个农民被邀请到莫拉和乌普萨拉参加传统的国王推举仪式，如同王国其他七个法定选区一样，“东方人”根据同样的权力也参加了国王的推举。考虑到从芬兰远道而来的诸多困难，特别时逢严冬，敕令指出如果东方人代表未能如期而至，仪式应予延期，且规定执法官一旦先于国王按时到位，即刻履责。1457年晚冬，王国议会试图迫使奥尔登堡
13 的克里斯蒂安同意，一旦芬兰代表不能按时出席庆典，他须在正式接受欢呼之前，同摄政达成协议。克里斯蒂安对此以下令在图尔库举行庆典而予以反击。1457年6月24日，克里斯蒂安加冕为瑞典国王的庆典适时在那里举行，王国议员、执法官、图尔库天主教全体教士、小贵族、芬兰农民和图尔库市民的代表出席了庆典。

图尔库的国王推选以及联盟的正式恢复首先乃是由一系列复杂的权力斗争所主导。以相似的方式，占有芬兰采邑同样加强了相互竞争

① 尽管不同团体，如军官们，都宣布作为王国的一个等级代表的权利，但是到17世纪中期，得到认可的是这四个等级：教士、贵族、市民和农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